



从大别山到宝塔山： 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先锋之路

□ 胡 珺



红二十五军部分指战员在两当的合影

1935年9月15日，陕北延川县永坪镇迎来了一支衣衫虽旧却精神饱满的队伍。历经十个月转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终于抵达目的地，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甘苏区的红军队伍。毛泽东称赞红二十五军为“中央红军的向导”。

这支队伍的故事，要从大别山深处说起。

大别山烽火铸军魂

1927年11月，黄麻起义打响了鄂豫皖地区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此后，商南起义、六霍起义相继爆发。三支起义武装的星火，在连绵起伏的大别山中汇聚。1931年10月25日，根据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决定，以三大起义的一部分工农武装为基础，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皖西六安麻埠（今属金寨县）正式成立。首任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11月，红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红二十五军随即编入其战斗序列。

在安徽的岁月里，这支年轻的队伍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1932年3月，苏家埠战役打响，红二十五军在陡拔河一带顽强阻击敌军，为战役取得空前大捷发挥了重要作用。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撤川陕，奉命留守的红二十五军一部分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坚持了下来。11月，鄂豫皖省委决定在鄂东重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此后两年，这支队伍在数倍于己的敌军反复“清剿”中浴血奋战，保住了大别山的革命火种。

1934年4月，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在商城豹子岩会师，合编为新的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这次合编为即将开始的远征做好了组织准备。

安徽不仅是这支军队的诞生地，更是其最坚实的后盾。皖西民众节衣缩食，将粮食、衣物源源不断送往前线。“父子兵”“兄弟兵”比比皆是，无数皖西青年怀揣革命理想投身行伍，构成了这支队伍最质朴的兵源基础。大别山“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深深融入了红二十五军的血脉。

万里征途写传奇

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第十四次常委会议。根据党中央指示，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实行战略转移。部队再次整编，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任副军长。

会后，部队西移至罗山县何家冲一带，进行整编和出发前的各项准备，撤销了师一级建制，全军直辖4个团。11月16日，2980余名指战员从何家冲出发，踏上了漫漫征途。出发当日，部队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11月17日，部队秘密由信阳城南穿越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由于敌重兵围追堵截，难以立足，鄂豫皖省委认为该地区不具备创建根据地的条件，遂决定继续向伏牛山区前进。

最危险的时刻出现在11月26日。部队行至方城县独树镇时，不足3000人的红二十五军突然遭到国民党步兵、骑兵近万人的猛烈攻击。当日寒流骤降、雨雪交加，战士们双手冻僵，拉不开枪栓。军政委吴焕先冲到最前面，他从交通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高呼：“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红二十五军与敌展开白刃激战，血战至黄昏，突出重围。徐海东后来回忆，此战“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红二十五军突出重围后，进入伏牛山区。这里人烟稀少、物资匮乏，地主围寨林立，群众深受反动统治控制，红军难以接触和发动群众，加之敌军尾追不舍，部队无法在此立足。省委和军领导研判后决定西去陕南。

12月8日，部队在豫陕交界铁锁关击溃守关民团，胜利进入陕南。至

此，红二十五军转战千余里，终于冲破数倍于己敌人的围追堵截。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入陕之后。1934年12月9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西省雒南县庾家河（今属丹凤县）宿营。这里地处杨虎城势力范围，而杨虎城正忙于对付陕北红军和川陕边的红四方面军，一时无力顾及陕东南。红二十五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12月10日，鄂豫皖省委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议，决定不在流动作战中耗尽力量，而是就地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并将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此后半年多时间，红二十五军先后在鄂豫陕边区建立了4块革命根据地。到1935年5月，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下辖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2个县、13个区、48个乡、314个村的苏维埃政权，苏区人口近50万。

指挥和完成这一系列创业的，是一群年轻人。长征出发时，军长程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34岁。营团干部多为20岁出头，连排干部和战士中十三四岁的“红小鬼”随处可见。1936年的《共产国际》杂志刊载过一篇《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的文章，文中这样叙述道：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被四表；从前的鄂豫皖苏区里，遭受异常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遗孤，那些在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种恐怖条件之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二十五军；他们还是幼小儿童就如大人一样懂事，他们亲眼见过白色恐怖的一切惨状，他们在幼年童稚时代就领略了一切政治常识……这一军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在13岁到18岁之间。就是这样一支以青少年为主的队伍，在战火中淬炼成钢，

后来走出了97位开国将军，被誉为“百将之师”。

孤军北上建奇功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北出终南山、直逼西安。部队从缴获的报纸中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的消息。7月15日，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次日，部队再次踏上征途。

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攻占天水北关，切断西兰公路长达数日，直接威胁国民党后方。国民党当局被迫从前线抽调兵力回防，这支部队将大批敌军牢牢牵制在陇东，在一定时期内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

8月，部队进入甘肃省静宁县兴隆镇回民聚居区。出发前，吴焕先专门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注重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赢得了回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后来中央红军经过此地时同样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得知情况后称赞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8月21日，红二十五军行至甘肃省泾川县四坡村，突遭敌军袭击，吴焕先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8岁。部队经过苦战全歼敌军。

9月7日，鄂豫陕省委在豹子川召开会议，决定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坪镇，胜利完成长征。次日，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后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已是深秋，部队缺衣少食，给养极度匮乏。毛泽东写信向徐海东借款2500块大洋。红十五军团仅有7000块大洋，徐海东毫不犹豫拿出5000块大洋送给中央，坚定表示“是送不是借”，同时还选送了大量缴获的武器弹药和棉衣。这5000块大洋被中央红军称为“雪里送炭”。毛泽东后来称赞徐海东对革命有大功。

红二十五军主力部队到达陕北时3400余人，由鄂豫陕根据地坚持斗争的还有2000余人，合计人数比出发时增加近一倍，创造了人数不减反增的奇迹。

从大别山的初创维艰到宝塔山的坚定从容，红二十五军完成了一次青春的远征。这支“儿童军”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贡献，铸就了不朽的先锋丰碑。他们的故事，从未走远。

明代学者丘濬的经济主张

□ 王 艳



明代中叶的政坛上，丘濬是一个重要人物，他以笃学之志修身、以济世之心为政、以务实之学立论，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留下了别开生面的一笔。丘濬为官四十载，历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户部尚书，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明史》称其“既官翰林，见闻益广，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丘濬所撰《大学衍义补》，涵盖经济治理、市场流通、货币财政、赋税民生等诸多领域，集中体现其经济主张，具有重要价值。

肯定劳动的价值。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明确提出“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世间万物虽生于天地，但必须经过人的劳作，才能成就其实际功用。在此基础上，丘濬进一步提出，“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其价有多少”。这里的“功力”亦指劳动。意思是说，万物的形态不同，耗费的劳动不同，价值也不同。提出劳动决定商品（世间之物）价值的观点，体现了丘濬在经济方面的超前意识。

反对“禁榷”制度。面对明代僵化的“禁榷”制度，丘濬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态度。丘濬认为，“市者，商贾之事”，商品买卖，是商人在交易中形成的，“民自为市，则物之良恶、钱之多少，易以通融准折取舍”。如果“官与民为市”，则“欲行之有利而无弊，难矣”，他还进一步指出，“以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丘濬反对官府对工商业的控制，但他同时也看到了完全由商贾来决定市场的弊端。他认为，官府应履行疏导监管的职责。针对明朝长期推行的海禁政策，丘濬认为这是徒劳的，因为“虽律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他建议开放海禁，允许民间进行海外贸易，官府抽分征税。既不需要向国内百姓加赋，又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丘濬这种包容开放的治理见解，在当时尤为难得。

注重货币的作用。明代中期，宝钞（纸币）贬值、铜钱杂劣、白银私行，“三币并行”导致市场混乱。丘濬直言“钞之弊在于多”，宝钞之所以失

败，根本原因在于朝廷无限制地发行，导致宝钞与实际财富之间严重脱节。基于这一认识，丘濬提出了“三币方案”：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市，钱为下币。以白银作为价值基准发挥“权轻重”的作用，银一分相当于钱十文或钞一贯，这样的比值关系“一定而永不易”；以铜钱和宝钞作为朝廷与民间日常交易通用的货币。丘濬还提出，朝廷应当根据市场流通的实际需要，调节货币的投放与回笼，“钱多出则出钞以收钱，钞多出则出钱以收钞”，力求做到“物与币两相当值”。

主张轻徭薄赋。在赋税征收问题上，丘濬继承了儒家“轻徭薄赋”的传统，但又赋予其新的见解。他认为“财者，民之心，得其财则失其心。苟得民心，吾虽不得其财，而其所得者，乃万倍于财焉”。这种理念构成了丘濬赋税主张的价值基础。他认为国家课税应遵循恰当的准则，“治国者，不能不取于民，亦不可过取于民”，并将取税于民比作“取鱼于泽”，认为绝不可太过，不能竭泽而渔，必须“薄取”“轻敛”。轻徭薄赋可以使民乐其

生，居者安心于田亩、流散者汇聚而来，生产发展则财政收入自然增加。在税制设计上，丘濬认为“土地万世而不变，丁口有时而盛衰。定税以丁，稽考为难，定税以亩，检核为易”，主张实行以土地为课税对象的制度，反对把户、丁作为课税对象。针对明代中期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乱象，他提出“配丁田法”，以特定年度为起点实行限田，从这一年度开始，“一丁惟许占田一顷”，超过一顷者，没收入官，由官方售给没有田地的农民。买田地者也只能买一顷，不能多买。限制皇亲国戚、利益集团多占地。

纵观丘濬的经济主张，虽然囿于时代限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他执念于金属货币观念，认为纸币是“以无用之物易有用之物”，未能充分认识到信用货币作为价值符号的本质。但总体上说，他的经济主张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土壤，既有立足时代的现实性，又有超越时代的前瞻性，为后世的经济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秋日的阿克苏，薄雾轻轻笼罩着整片原野。天色微亮，天地间笼着一层薄薄的轻纱，万物尚且蛰伏在清晨的慵懶里，广袤的田野已然挣脱夜色，悄然苏醒。漫步田埂，脚下的泥土湿润松软，裹挟着秋雨浸润后的清爽气息扑面而来。青绿的稻叶尖上，缀满了晶莹剔透的露珠，一粒粒凝在梢头，微风一过便轻轻颤动，簌簌坠入泥土，悄无声息。

秋风徐徐掠过阡陌原野，裹挟着层层叠叠的芬芳。新稻的清冽醇香、核桃的温润木香、苹果的清甜蜜香，几种味道交织在一起，弥漫在空气中。站在这片辽阔的田野上，内心满是安宁与踏实。

眼前的稻田，是秋日最壮阔的风景。朝阳穿透薄雾，缓缓洒落田间，连串的稻浪，翻涌着金色波光，一望无际，熠熠生辉。田间的联合收割机轰鸣前行，稳稳穿梭在金色稻海之中。我驻足观望，机器驶过之处，稻秆整齐倒伏，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涌入储粮舱，沙沙的收割声连绵不绝、此起彼伏，汇成秋日最热闹、最动人的丰收乐章。

驾驶收割机的伊明江大哥，神情从容又专注。朝阳落在他黝黑的脸庞上，勾勒出质朴的轮廓。常年风吹日晒的肤色，是庄稼人最朴实的勋章。劳作之余，他抬头望向整片成熟的稻田，眉眼间藏不住笑意。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心底的笃定与欢喜，春种秋收，辛苦大半年，终于等来满田丰收，这份踏实，是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

顺着田埂前行，穿过一片挺拔苍翠的杨树林，郁郁葱葱的核桃林便豁然映入眼帘。浓密的墨绿树冠，撑起连片绿荫，枝头缀满饱满的青核桃，沉甸甸压弯了枝条。改装后的拖拉机拖着振动架，缓缓穿行林间，低沉的引擎声响起，成熟的核桃纷纷脱落，哗啦声此起彼伏，如细碎疾雨砸向地面，热闹鲜活，治愈人心。小伙子们和姑娘们拎着桶，穿行在核桃林下，忙碌地捡拾着落地的核桃，清脆的笑声回荡在田野之间。

走出核桃林，抬眼望去，连片的苹果园热烈明媚，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果农们挎着竹篮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箱，动作娴熟利落、从容有序。年轻姑娘阿孜古丽踮起脚尖，轻巧摘取枝头的红苹果，指尖轻柔翻转间，圆润饱满的果子，稳稳落入藤编果篮。叶隙洒落的暖阳，映亮她绣着石榴花的彩色裙摆，也为鲜红的苹果镀上一层温润的金辉。

继续往果园深处走，我遇见了阿克苏独有的特色水果——杏李，当地人亲切地称作“恐龙蛋”。杏李兼具杏子的绵软细腻与李子的脆爽清甜，风味独特，唇齿留香。阳光下，一颗颗杏李圆润饱满，果皮细腻的纹理折射出细碎光斑，温润喜人。果农们有条不紊地完成采摘、套袋、装箱每一道工序，用心呵护着每一份收成。孩子们围着果树嬉笑奔跑，捧着新鲜的果子欢呼雀跃。

午后的阳光褪去燥热，变得温柔和煦，为整片大地覆上一层暖融融的橘色柔光。村口的晾晒场上，铺展开一幅质朴动人的秋日烟火画卷。火红的辣椒串成条条红绸，热烈明艳；金黄的玉米整齐铺展，璀璨夺目；暗红的大枣连片铺开，如绯云霞彩铺满场院，五彩斑斓，烟火氤氲，尽显秋收的丰盛。

头戴鲜艳头巾的各族妇女，蹲在晒场上，细心翻晒着各类作物，动作轻柔又熟练。她们认真打理着每一份收成，像呵护珍宝一般，温柔又专注。场边的小桌上，铜壶煮着醇厚的砖茶，袅袅热气伴着瓜果的清香，缓缓升腾，温柔又治愈。暮色将至，劳

大地秋语

□ 王建江

作一天的乡亲们，驾乘电动车缓缓返程，清脆的鸣笛声，划破乡野静谧，喧嚣过后的平和安宁，最是抚慰人心。

夕阳缓缓西沉，漫天晚霞浸染天际，温柔暮色笼罩四野。白昼里热闹繁忙的田野，渐渐归于宁静。我独自站在田埂上，听风吹过收割后的稻茬地沙沙作响。远处牛羊归圈的铃铛声，悠悠传来，清脆悦耳。

暮色渐浓，村落灯火次第亮起，柔和的光散落街巷。袅袅炊烟缓缓升腾，裹挟着美食的醇厚香气，漫遍野陌阡陌。家家户户的餐桌之上，摆满了秋日最新鲜的食材：热气腾腾的羊肉抓饭、奶香四溢的核桃仁、蜜心透亮的冰糖心苹果、清甜湿润的杏李、一桌烟火，满目丰盛。乡亲们围坐灶火之下，闲话一年收成，畅谈来年期许，欢声笑语温柔绵长。人间最安稳的幸福，往往不是在繁华喧嚣里，而是藏在春耕秋收的烟火日常里。岁岁年年，耕耘不辍，烟火绵长，便是世间最好的光景。

夜深人静，星河璀璨。晚风轻拂中，我站在空旷的晒谷场上，仰望漫天星河。身处这片安静的大地之上，更能清晰地感受到土地鲜活的脉搏：它在泥土中，默默积蓄生机；在草木枝干间，沉淀四季力量；在每一位边疆劳动者手中，传递着生生不息的希望……一代代阿克苏儿女，扎根这片沃土，以汗水浇灌岁月，以耕耘守护家园，让这片边疆热土岁岁丰盈、年年繁盛。

阿克苏的秋天，从来无关萧瑟落寞，只写土地的慷慨赤诚，礼赞劳作的热烈滚烫。行走在全域丰收，我终于读懂了最动人的大地秋语。这藏在山河烟火里的秋日收获，印证着大自然最朴素的哲理，是劳动创造幸福最鲜活的时代注脚，更是边疆大地各族儿女相守相依、共生共荣的深情告白。四时轮转，风雨更迭，所有春风夏雨、秋霜冬雪，最终都将沉淀为满仓粮、满枝果、万家灯火，滋养边疆这片热土，温暖一方人间。大地无言，它将最纯粹的热爱，尽数回馈勤恳守护它的每一个人。这朴实丰盈的秋日盛景，是生生不息的生命赞歌，是脚踏实地的劳动礼赞，更是乡土中国最温暖、最坚定、最有力量的希望之光。

